



□ 隋云鹏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铁器、初税亩、新兴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土地兼并、繁刑重敛、战争频发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孔子把“仁”确立为人的本质、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赋予“仁”哲学本体论意义，对个体生命人生意义的确立和国家治理提出了系统的解决方案，彰显了深邃的人文考量和深远的历史眼光。

较早出现“仁”字的儒家典籍有《尚书·金縢》《诗经》《周易》等，《说文解字》认为“仁，亲也。从人从二”，也有学者认为西周金文中“仁”字字形从“女”从“二”。因此，“仁”字本义是二人或者说多人，实际上指代了整个人类社会，指明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确立了个体生命的人生意义在人类社会本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然，这个人类社会首先是家庭，因为一个人出生后，他（她）所面对的第一个社会关系是他（她）的家庭关系。家庭是儒家学说实践的主要对象，孝悌也自然成为仁的核心方法论，“其为

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儒家贤圣均对“仁”研究甚深，结合各自时代条件做出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阐释，赋予“仁”深厚的人文精神，把“仁”确立为儒学的核心范畴，以至于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仁学。“仁”字在《论语》中多次出现，从孔子与其弟子对仁进行的较为全面的阐发来看，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其实现路径是克己或者说自爱、自律，“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记·中庸》《礼记·表记》《孟子·尽心下》提出“仁者人也”的观点，认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朱熹也认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本质），做到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便是仁，从而将仁与理联系起来，为自己的理学提供理论支撑。孟子将仁与心联系起来，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所以“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

者人恒敬之”。王阳明提出良知的哲学命题，良知是仁的集中表现，仁的实现路径是“致良知”。可见，儒学对仁的重视，实质上是对生命的重视，由此出发，儒学产生了人是天地之心、最为天下贵以及民为邦本、有教无类、民胞物与等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观点，而“博爱”最早出自《孝经·三才章》“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由于儒学奉行以孝治天下，具有平等思想的博爱没能成为儒学的重要范畴，尽管如此，博爱还是为中学、西学交流互鉴搭建了桥梁。由于博爱与仁联系在一起，因此，儒学中的博爱首先是自爱，体现在个体生命层面上要克己、慎独、自律，然后由己及它、由亲及庶、由近及远但无边界，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直至天地万物。

宋明以来，随着儒学西传，儒学仁爱观对欧洲产生了深刻影响。上世纪40年代，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张彭春坚持加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对

应的英文单词，最后将接近“仁”的“良心”（conscience）写入，从而谱写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段佳话。

千百年来，儒学倡导的“仁者爱人”为无数的个体生命带来了人文关怀和心灵温润，从而使“仁者爱人”具有了穿透历史、贯通中西的精神力量。爱人是仁者最核心的品质，仁者肩负着爱自己、爱亲人、爱众生、爱世界的使命和责任。为了实现这一使命和责任，仁者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时，由于知晓己的使命和责任，仁者无论面对多么恶劣的处境，都能坚守仁心，乐天知命，不怨天，不尤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上接1版二条）

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等根本问题，关系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方面面，各个方面的关系纷繁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进行顶层设计，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决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既要通过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谋划、战略布局和整体推进，又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而群策群力、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使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形成历史合力。

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关系。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方向，在根本问题上绝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的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要增强战略的全局性，谋划战略目标、制定战略举措、作出战略部署，都要着眼于解决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要增强战略的稳定性，战略一经形成，就要长期坚持、一抓到底、善作善成，不要随意改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的具体的历史实践，必须在策略问题上落到实处，绝不能纸上谈兵。我们要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临机决断，在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战略主动。

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

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创新就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着眼于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充分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所决定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我们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秩序代表着社会的有序、和谐与稳定，而活力则蕴含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是社会各群体创造力的竞相迸发和个人潜力的充分发挥，体现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与完善社会公平的激励机制来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同时，我们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确保发展的稳定环境。

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以

参考，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始终坚持自信自强，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找到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自己的路，并不意味着封闭僵化和固步自封，走自己的路不能排斥其他道路，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树立忧患意识，时刻保持高度的风险警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

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我们要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的精神，同时又要保持战略主动，增强斗争本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

加强斗争本领养成，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面对矛盾问题和激烈斗争，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敢于斗争、勇于胜利，而且要在攻坚克难中磨砺斗争智慧，在实践中增长斗争才干。唯有多经历几次“风吹浪打”，多摔几个“烫手山芋”，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经受摔打磨炼，才能丰富人生阅历，在斗争过程中砥砺斗争精神、积累斗争经验、增强斗争本领。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持之以恒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勇于直面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自觉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重任。

确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激励各级领导干部勇于担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党的干部是干事创业的骨干、冲锋在前中坚。国内外形势越严峻复杂，风险挑战越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艰巨繁重，就越需要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组织上要为改革者撑腰，要为担当者担当，坚持“三个区分开来”，注重对敢担当、善作为干部的激励保护，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注重在严峻复杂斗争中考察识别干部，为敢于善于斗争、敢于担当作为、敢抓善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撑腰鼓劲，看准的就要大胆使用。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更好用武之地，最大限度激发担当作为、攻坚克难正能量，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良好氛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合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上接1版头条）

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加快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激励政策“能给尽给、应给尽给”，实施科技研发投入在业绩考核中全部视同利润加回、重点核心研发团队工资总额单列等政策，加大对国企科技创新支持，全面激发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潜能有效激发。研发投入强度进一步加大，中央企业2022年研发投入经费超1万亿元，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重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5.6%。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遴选首批29户“重点支持类”原创技术策源地企业先行先试，推动中央企业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实施“央企攻坚工程”一期并圆满收官，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科改示范行动”成效显著，与2019年相比，2021年209户“科改示范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提高了6.5个百分点，新增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增长了69.5%，2022年“科改示范企业”扩围至440户。三年行动期间，国有企业在航天、深海、能源、交通、国防军工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一系列“上天入地”的国之重器彰显了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力军地位，为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重要支撑。

市场化经营机制取得大范围深层次突破

坚持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深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转换内部经营机制。将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作为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的“牛鼻子”，在各级国有企业全面推行，与2020年底相比，开展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各级子企业比例从23%左右提升至99.6%以上，覆盖全国超8万户企业、22万人，形成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新型经营责任制。市场化用工机制深入推进，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新进员工公开招聘比例由2020年底的88.9%、87.6%均提升至99.9%以上，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的管理人员比例分别由2.5%、1.9%提升到5.7%、4.5%，管理人员竞争上岗比例分别提升至57%、56.3%。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持续优化，灵活运用股权、分红、跟投等多种中长期激励工具，具备条件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子企业中已开展中长期激励的比例分别达到94%、88.8%，惠及超49万名国企骨干员工。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深度转换，70%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有外部投资者派出的董事，2020年以来累计推动92户国有股权超过50%的上市公司引入持股比例5%以上战略投资者作为积极股东，85.7%的重要领域混改试点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增长，平均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6%，其中45.7%的试点企业引资后净利润率提升超过2个百分点。“双百行动”打造了一批改革先锋，2021年400余户“双百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127.15万元/人。上海、深圳、沈阳、杭州、武汉、西安开展“区域性综改试验”，形成了一批国资国企区域综合改革发展典型。通过实施三年行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机制广泛建立，推动广大国有企业形成了多劳多得、争先创优、有为才有位的浓厚竞争氛围，许多传统老国企焕发了新气象，一大批活力迸发、动力充足的现代新型国企正在形成。

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更加健全

在坚持和完善国资监管体制上持续探索创新，推进授权与监管相结合、放活与管好相统一，加快形成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国资监管新模式。国资监管职能体系更加完善，强化各级国资委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责、专司国有资产监管职责和负责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三位一体”职能配置。国资监管效能切实增强，建立“一利五率”（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资产负债率、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现金比率）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统筹稳增长、抓改革、强创新、促发展、防风险等多重监管目标，强化全方位全过程体系化监管。公益性业务分类核算、分类考核在中央企业试行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深化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组建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国家管网集团，电力油气体制改革取得新成果。中央企业5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2家资本运营公司在支持国资国企重大改革落地、促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资监管大格局加快构建，建立中央、省、市三级国资监管机构联动工作机制，建成全国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省级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比例提升

至99%。五年来中央企业没有发生一起债券违约事件，一批高负债企业负债率回归合理水平，一批高风险业务得到有效清理，国资监管效能和防风险能力有效提升。实践证明，我国国资监管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适应党的全面领导体制、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的。

改革抓落实工作机制扎实有效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落实“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要办事”要求，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形成一套具有鲜明国企改革特点的抓落实工作机制。实施军令状制度，落实各部门、各地区、各国国有企业第一责任人制度，做到“军中无戏言”，各地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靠前指挥，推动三年行动各项任务精准落地。坚持系统化推进，按照“一个抓手、四个切口”要求，加强统筹协调，各改革主体之间、政策措施之间、改革成效之间更加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建立清单化举措，细化制定改革任务台账，各有关部门、地方、中央企业分别形成337项、3266项、13258项任务举措，成为推动改革落地见效的重要抓手。实行穿透式操作，召开中央企业、地方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进会，“一月一主题”召开17次专题推进会（月例会），通报进展、推广经验、专题部署重点难点问题，会议以视频形式直达二三级子企业，一次视频会最多覆盖2000多个分会场30000余人参加，实现“一竿子插到底”。开展量化督办，建立在线督办系统，首次实现对中央企业126个指标、地方113个指标的量化采集和监测。对改革进度慢、效果差的43户中央企业和15个地方印发督办函，对15户中央企业和9个地方开展三年行动专项督查，对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等重点改革任务开展随机抽查，量化开展三年行动中央企业考核和地方国企评估。注重典型性推广，通过“学先进、抓落实、促改革”行动、月度例会发言交流、三年行动简报等多种形式搭建改革经验交流平台，在主流媒体广泛宣传改革典型和成效，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是国有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其突出特点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深入推进激励、责任、竞争、创新等基础性制度建设，既坚持中国特色又参照国际经验，既注重顶层设计又鼓励基层创新，既以钉钉子精神行动又润物细无声，推动一系列重大举措平稳落地见效，力求制度健全、行动到位、效果显著。三年行动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独立市场主体地位，推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2021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较2020年分别增长18.7%、26.3%，2022年国资委监管中央企业年化全员劳动生产率较三年行动之初增长32.5%。三年行动有力推动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功能作用提升，更好发挥国有企业战略支撑作用，在世纪疫情严重冲击、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生产经营经受多重考验的严峻形势下，国有企业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应对通胀稳定物价、保障能源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实施三年行动，国有企业干部职工获得感和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对近80万名国资国企职工开展的不记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0%的调查对象认同三年行动提升了干部职工的改革意识、创新理念、精神面貌和干事创业热情。

国企改革永远在路上。虽然三年行动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习近平总书记任内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也提出了明确要求。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and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迈向新征程，深化国企改革要着力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巩固已有改革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经营机制长效化制度化，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着力增强核心功能，更好发挥战略支撑作用，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向重要行业 and 关键领域集中，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更高质量效益和更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引导行业领军企业加快建设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